

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

李若建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 人口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论文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大跃进中部分人的行为。认为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导致人们更多的以紧跟上级的“政治正确”作为行动的方向, 而大量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激发起一种狂热的情绪, 非制度化的精英更替带来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 大家明哲保身, 下放产生的大量社会地位不一致者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 大跃进; 社会流动; 精英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02)05-0141-08

大跃进中的许多事情荒唐到极点, 然而这种荒唐为什么能被大多数人接受, 特别是被基层干部所接受, 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如果大多数人能够有比较清醒的头脑, 大跃进的破坏是可以减轻的。例如在困难时期广西博白县的人口损失比周围县小, 其原因是该县的县委书记坚持要按常规进行冬种, 而不是赶时髦深挖土地,^[1]因此比周围地区多生产了粮食。接下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种县委书记是少数。美国社会学家 R. K. 默顿提出个人适应形式的类型, 其中的以革新来适应社会的这类人, 他们适应形式文化目标是合法的, 制度化的手段却是非常规的。但是这种革新的压力与动力对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是存在的, 对广大基层干部和民众来说是不突出的。因此用默顿的观点来说明大跃进中大量的非制度化行为存在局限。本文试图从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对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不过要强调的是大跃进中从高层领导到普通民众的行为是复杂的, 动机也是多样化, 本文只是试图从一个新的视野去剖析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别的年代, 同时也期望可以用这一视野去看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变, 因此并没有把大跃进的形成与大跃进过程中诸多现象简单归因于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

本文把社会流动模式界定为社会流动的渠道、机会、社会精英阶层的更替。在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中, 大部分关注的是个人特征、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个人或群体的社会流动, 而对社会流动模式改变对社会价值观念、人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则很少考虑。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流动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初期的西方国家, 他们的社会流动模式已经非常固定化, 一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社会流动的模式没有根本的改变, 因

*收稿日期: 2002-05-22

作者简介: 李若建(1956-), 男, 福建厦门人,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此西方社会学很难从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去研究社会。近年来社会学界对中国的社会流动研究比较关注，但是其研究的理论架构与方法基本上受西方传统研究的限制。^[2]

一、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

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流动的渠道发生过两次根本性的改变。一次是在国民党政权垮台后，一种和传统中国社会流动方式有根本性差别的社会流动渠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建立起来，另一次是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新的社会流动渠道。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流动的渠道是非常狭隘的，在隋唐以前封建门阀制度基本上把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道路阻塞，实行了科举制度以后，虽然少数十年寒窗的学子有可能一举成名，但是其数量极少。根据对清代的915名贡生、举人、进士的家世背景研究，67%的人父亲当官，83%的人三代内有祖先当官，87%的人五代内有祖先当官。^[3]在这种渠道下，大多数社会底层人士只有在动荡年代通过从军，靠军功而得上升。

辛亥革命后，传统的乡绅政权模式发生了一点改变。过去在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县衙门与农民之间是所谓的士绅阶层，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加强了乡镇与保甲两个管理层，但是乡绅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一些研究表明，当时的保甲阶层中许多人属于农村中等阶层偏下、能说会道的一些人，为了生活而担任保甲。^[4]虽然在民国年间的基层政权架构开始建立，传统的乡绅阶层对农村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变革。

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的社会上层被打倒在地，大部分旧的社会精英失去往日的威风。虽然从军依然是一条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5]，但是更多的社会流动是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渠道进行。有的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流动用了一个“政治录用”的概念，指出“积极分子、干部和党员，这三种核心政治角色主导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人员安排。”积极分子是政治录用的第一步，在官方的观点中，“正确”的动机是成为积极分子的根本因素。^[6]

19世纪的法国社会学与人口学家迪芒（Dumont, Arsene）提出了“社会毛细管现象”，就是说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人都有不断向上发展的希望和可能。^[7]虽然迪芒是用这一观点去解释法国人为了社会地位上升而放弃生育需求，不过他说明了现代社会两个重要变革，一是社会流动机会增加，二是大部分人有向上流动的欲望。在当代中国大概没有可能否认也存在“社会毛细管现象”，在特别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跃进中的荒唐与破坏。

解放后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社会流动的机会，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旧政权被完全更新；二是除了少量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之外，旧的社会上层变成了社会底层。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成为社会的底层，但是其社会地位也明显下降。在当时社会流动的主要条件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达：家庭出身 + 本人政治表现 + 上级领导赏识程度。

在大量的向下流动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向上流动。而要向上流动，政治上的正确是最主要的途径。要作到政治上的正确，就必须紧跟上级。为了达到向上社会流动的而紧跟形势，恐怕是当时不少人的行为动机。因此可以认为建国初期社会流动渠道的改变，改变了人的价值体系也改变了人的行为，这种以政治正确为导向的社会流动渠道，对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非理性的行为，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技术精英阶层来说，除了上述的社会流动途径之外，通过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而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的情况依然存在。不过这些人很快就发现自己属于“只专不红”甚至是“白专”的技术精英，要成为“又红又专”真正精英阶层的话，要进行刻骨铭心的改造。在反右派运动中，技术精英中有不少人为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正确而付出了浪费一生的代价。

二、精英队伍的高速扩张产生的机会与后果

由经济学转向社会学的帕累托提出了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社会稳定的一个方法是群众中有能力成为精英的人被吸收到精英队伍中^[8]，中国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一作用。建国初期给群众中的潜在精英，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这种机会一方面体现在改变精英获得途径，另一方面体现在大规模扩张精英阶层。

精英阶层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扩张干部队伍与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来实现。建国后干部队伍迅速膨胀，1949年国家干部72万人，1952年331万人，1955年527万人，1958年达到792万人。^[9]从河北省的情况可知，在1949~1960年间，干部数量平均每年递增4.5%，干部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0.5%到1960年的接近2%（河北省委组织部编：《河北省干部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99）。这种增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只要家庭出身好，社会中大部分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人，要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在干部队伍迅速扩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也急剧增长。从1949年的448.8万人到1961年的1700万人，党员数量接近翻两翻，大体上5~6年的时间翻一翻。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加入共产党基本上没有了战争年代的生命危险，而是成为社会精英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对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精英队伍的扩张对相当一部分群众来说是改变社会地位的好机会，但是扩张速度过快也容易产生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进入精英队伍的人员素质下降。对于一些尚不具备精英才华的人来说，只是家庭出身好和政治投机就可以成为精英，造成精英阶层整体素质下降；（2）助长了政治投机的风气。由于机会太多，只要政治上正确和上级领导的赏识就可能成为精英，因此瞒上欺下、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事情屡见不鲜；（3）在强烈向上社会流动的欲望驱使下，当发现向上的位置已经被占据的时候，利用政治运动把挡路的精英拉下马的动机强烈，造成在政治运动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互不信任；（4）空前规模的、大量的向上社会流动机会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激发起一种狂热的情绪，特别是一些本来不具备成为精英素质的人，产生了向上流动的欲望，为了表现自己而丧失理性。

三、非制度化的精英更替带来的祸害

只要一个社会不是僵化的，那么其精英阶层就会流动。然而这种精英更替要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否则，各种手段就会应运而生，导致种种不幸。当年这种精英的替换往往是以政治上的正确，主要是紧跟上级的程度来决定的，这导致一些官员对下级掌握生杀大权。在反右运动中一些官员的逻辑令人可怕，当年只要批评某基层支部书记业务不熟悉，不称

职、官僚主义，就会划成右派。其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是由若干支部组成的，各单位的领导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如果把整个支部、每个领导都攻击垮了，整个共产党岂不垮了。^[9]这种荒唐的逻辑让老百姓再也不敢公开对上级指手划脚地批评了，只能对干部绝对服从。

在大跃进中损失惨重的地区，往往在人事更替上有两个特点，一是高层官员在 1957~1959 年间受到批斗，二是在反右运动中大量人员被打成右派。

在 1957~1959 年间被批判的省级官员名单：省委第一书记有河南的潘复生、湖南的周小舟，省委副书记有安徽的张恺帆、甘肃的霍维德、湖南的周惠，省长有浙江沙文汉、青海孙作宾，副省长有广西的陈再励。这些高官被批判，往往是以一个反党集团的罪名进行，牵连到一大批各级官员，有的还涉及到地方派系。例如 1958 年河南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均为原来的平原省官员，该案株连数以万计，致死逾百人。^[10]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浙江省之外，这几个有高官被批判的地区都是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损失惨痛的地区。^[11]

毫无疑问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当代历史的悲剧。大部分右派分子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其构成主要是各级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在少数地方右派中也有其他人，例如在云南的元谋县，被打成右派的竟有仓管员、售货员、炊事员和未成年的中学生^[12]。当年无论是在繁华的大都市，还是在穷乡僻壤，没有哪个地方不抓右派的，不过各地右派占人口的比重却有所差别。由于反右派主要是针对城里人，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右派占当年城镇人口的比重。

反右派中划成右派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 0.85%，占市镇人口的比重是 5.2%，虽然各地都有右派，但是有的地方比重特别高。1957 年河南省有 6 万人被打成右派，占全国右派的 15%，占河南干部的 15%，^[13]占全省人口的比重是 0.31%，占市镇人口的比重是 11.4%。在四川省，除了有 4.5 万人被打成右派之外，还有约 40 万人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14]两者合计相当于当年全省人口的 0.6%。河南与四川在困难时期人口损失惨重，是否与反右中社会精英阶层被打击过多有关，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仔细分析表 1 中右派占城镇人口的比重，从中可以发现在困难时期人口损失惨重的地区大多数是右派分子占城镇人口比重高的地区。如果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标准，在这标准以上的有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青海。这些地区中，除了广东情况略好之外，其他地区在困难时期都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表 1 1957 年部分地区右派人数及占城镇人口的比重 (千人,%)

地区	市镇人口	右派人数	右派占城镇人口比重	地区	市镇人口	右派人数	右派占城镇人口比重
全国	106195	553	5.2	江西	2354	12	5.1
北京	4011	12	3.0	山东	5367	30~40	5.6~7.5
天津	3225	5	1.6	河南	5281	60	11.4
河北	5734	26	4.5	湖北	4114	46	11.2
山西	2892	11	3.8	湖南	3150	31	9.8
内蒙古	1964	4	2.0	广东	5409	30多	>5.5
辽宁	9379	25	2.6	广西	1622	14	8.6

吉林	3838	10	2.6	四川	7797	45	5.8
黑龙江	5651	12	2.1	贵州	1949		缺资料
上海	6897	15	2.2	云南	2436	约 10	约 4.1
江苏	7661	13	1.7	陕西	2884	8	2.8
浙江	3645		缺资料	甘肃	2308	12	5.2
安徽	3172	约 30	约 9.5	青海	527	13	24.7
福建	1906	7	3.7	新疆	1022	3	2.9

资料来源：散见于各地方志、《当代中国丛书》中，因册数较多，不一一列出。

广西环江县在大跃进中，放了一个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在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巨大。这个县在反右运动中，县委正副书记中 3 人，8 个区委书记中的 4 人被打成右派，另 1 个打成“中右”，^[15]如此高比重的基层官员被打成右派在全国少见，这两件事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

表 2 是黑龙江省 1949~1963 年间处分党员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大跃进期间是处分党员的一个高峰期。吐故纳新，有处分的也有补充的，1959 年全国提拔县处级以上干部近 6 万人，县处级以上干部比 1957 年增加 18.7%，其原因一是大跃进，二是填补被划右派者的空缺。^[16]在政治运动中人事制度形同虚设，下级的命运取决于上级好恶的非制度化人事变动，产生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结果，这种情况使一些人喜欢运动，期望通过政治运动打倒一些人，为自己向上流动开路。

表 2 黑龙江省部分年份受处分党员情况

年份	受处分党员 (人)	占党员比重 (%)	年份	受处分党员 (人)	占党员比重 (%)
1949	689		1960	8503	1.56
1956	4800	1.26	1961	6778	1.20
1957	3848	0.99	1962	5168	0.97
1958	13441	3.46	1963	6834	1.34
1959	10045	2.11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志·共产党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9 页

在大跃进前后的那个年代，一些被打倒的精英下台的原因是他们还不够左，例如安徽桐城县 1957 年粮食产量实际为 2.9 亿斤，县委成员对粮食产量的计算有不同看法，有的说 3.7 亿斤，有的说 4.3 亿斤，结果说 3.7 亿斤的县长成为右派分子。^[17]这种政治文化的结局只有一个：让人越来越左。

非制度化的精英替代的更加严重后果是大家明哲保身。一位在 1937~1945 年遭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德国人说的一段话让世人深思，他说：“开头，他们（法西斯）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敢说不，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接着，他们来抓工联主义者，我也没敢说不，因为我也不是工联主义者。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还是没敢说不，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无人可以为我说不了。”^[18]

如果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运动，可以发现虽然明哲保身没有给社会精英带来真正的安全，没有多少人最终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但是也极少有人敢于为别人的冤屈打抱

不平。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制度化的精英替代产生的恶果，因为谁也无法有依据替人辩护，也深怕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会莫名其妙的失掉，这种心态让人在大跃进中不敢对荒唐说“不”。

四、向下流动者的回升欲望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如果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地位不一致”情况，这些不一致者的心里头是比较不舒服的，而在大跃进前正好制造出一大批这种人。根据新西兰的一项研究，表明社会流动强烈，特别是向下流动强烈的人，自杀率明显高于没有社会流动的人群。^[19]除了右派之外，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因为前有反右运动，后有 大跃进，并且大跃进后这些人大多数返回城镇，因此这批人的命运很少被关注。下面是部分地区的下放情况：黑龙江省共精简下放 14 万人^[20]，安徽省在 1957 年共下放了 5.9 万人^[21]，1957 年湖南省共下放干部 10 万人，充实到农村和厂矿基层^[22]。从这些零碎资料中可以断定，1957 年的下放干部规模至少在 100 万人以上。

下放者的安排如何，笔者很少看到相关的文献记载。甘肃省岷县的一份资料可能对这些人的去向有帮助。1957 年该县精简下放干部 275 人，其中有科长、区长、乡长等有“官衔”的 63 人。下放的去向：调整工作 25 人，转任小学教员 12 人，回乡生产的 148 人，转为工人的 10 人，转为基层供销社、商店人员 80 人。^[23]根据岷县的情况，半数以上的下放干部变成了农民。安徽省的下放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官低任，在干部下放后，80% 以上的县委书记是地委级干部担任，80% 以上的区委书记是由县委干部担任，平均每乡有 2 个区委干部，每社有 1~2 个区或乡干部。^[21]从上级领导意图来看，安徽下放干部的降级安排有两个目的，一是精简机构，二是加强基层领导，但是在客观上造成大批干部社会地位不一致的情况。当代中国官本位相当严重，一个官员的官阶与他实际权力之间产生比较大的落差时，其内心的不平是相当强烈的。

在当代中国的下放，其实是一种有特色的向下社会流动。被下放者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有官场中的失败者，当然也有少数希望通过下放取得政绩的人。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被下放的人在原来的工作单位中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工作可以被轻易替代。因此在被下放的人中，有人心灰意冷，也有人试图东山再起，大跃进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表演的大舞台。大跃进时创建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遂平县嵒嵒山人民公社，就是在该地指导工作的县委农工部长导演下产生，这位部长亲自担任公社党委书记，^[24]1959 年该公社的一个小麦高产卫星就是在县委工作组长的压力下产生^[25]。

大跃进时任河南省唐河县委书记的一位官员，在 1960 年因害怕其在大跃进的行为受到处分而自杀，在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中，他是直接因大跃进而死的最高级别官员。这位官员就是 1957 年从省里的一个处长调到县委当书记的。^[26]

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在 1958 年放的水稻亩产 3.7 万斤的“特大卫星”，是一个由区宣传委员到该社当社长的干部吹出来的。^[27]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柯冲生产队在 1958 年放的水稻亩产 4.3 万斤的“特大卫星”是 3 位地委进驻的工作组炮制的。^[28]

因为现在有关大跃进的资料还非常残缺，无法对当年的种种浮夸作全面的研究，但是在笔者看到的文献资料中，还没有发现大跃进时期哪个“卫星”与下放干部或者下基层的

官员无关。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农民比较朴实，想不出那么些鬼点子；第二是一些下放干部急于建功立业表现自己，争取尽早回到自己原来的官位上。可以认为有一部分下放干部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讨论

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的一场大灾难，在这场灾难中内陆地区的人口损失远超过沿海地区^[29]，当然这与粮食征购与调拨有关^[30]，但是粮食征购和调拨的失误与内陆各地的浮夸是相关的。

如果把大跃进时期大招工的情况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内陆地区的大起大落，笔者曾提出过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人的向上社会流动欲望更强烈，因此对大跃进给予的机会抓得越紧^[31]。其实从反右运动中，内陆地区打右派的比重明显高于沿海的情况，我们是否能推测这也是一种向上流动的欲望在起作用呢。

由于资料问题，对历史的回溯研究很难得出一种量化的结论，因此本文只是想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点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观点：

第一，社会流动的模式对人的行为产生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非常强大的。

第二，大跃进中许多人的行为可以认为是为了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而产生的。不合理的社会流动模式是产生大跃进灾难的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 [1] 博白县志 [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 [2] 边燕杰主编.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3] 周荣德. 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 [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 [4] 朱德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5] 李若建. 广州市老人终生职业流动研究 [J]. 人口研究，2000（1）.
- [6] [美] 詹姆斯·R·汤森. 中国政治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 [7] 刘铮等. 人口学辞典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8] [法] 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9] 云南省志·审判志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0] 杨继绳. 河南‘潘、杨、王’事件前后 [J]. 文史春秋，2001（9）.
- [11] 李若建. 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 [J]. 中国人口科学，1998（4）.
- [12] 元谋县志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 [13] 乔培华.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刘少奇对河南的关注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6）.
- [14] 当代四川大事辑要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15] 王定. 大跃进广西放了颗大灾星 [J]. 炎黄春秋，1998（4）.
- [16] 党政领导干部统计资料汇编 [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
- [17] 桐城县志 [M]. 合肥：黄山书社，1995.
- [18] [英] 马丁·吉尔伯特. 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二卷）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9] [英] G·罗斯. 当代社会学研究解析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 [20] 黑龙江省志·人事编制志 [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21] 安徽省志·人事志 [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 [22] 曙初. 1957年整风反右 [J]. 湖南党史, 1996 (3).
- [23] 岷县志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 [24] 杨洪涛. 天堂实验纪事 (一) [J]. 中州统战, 1998 (5).
- [25] 杨洪涛. 天堂实验纪事 (一) [J]. 中州统战, 1998 (7).
- [26] 靳占修. 浮夸忧思录 [J]. 中国统计, 1995 (2).
- [27] 章跃兵. 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 [J]. 炎黄春秋, 1995 (3)
- [28] 安徽省志·附录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
- [29] 李若建. 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 [J]. 中国人口科学, 1998 (4).
- [30]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粮食生产、消费与流通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6).
- [31] 李若建. 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 [J]. 社会学研究, 2001 (6).

(责任编辑 许玉兰)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Mobility Mode and the Moveme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I Ruo-jian

*(The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mobility mode influenced the human behavior during the moveme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 in the 1950s. The chance of move upward in the society caused fanaticism among many people. The non-institutionalized replacement of the elite leads to the fierce struggle between people. The rapid changes of social status influenced people's ambition.

Keywords: Great Leap Forward; social mobility; elite